

沈复

散文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终审：徐柏容
责任编辑：任少东
封面题字：王 祁
封面绘画：蔡 红
封面设计：益书友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

柳宗元散文选集
袁 枚散文选集
司马迁散文选集
张 岱散文选集
钟 惺散文选集
欧阳修散文选集
曾 巩散文选集
侯方域散文选集
方 苞散文选集
归有光散文选集
王思任散文选集
姚 鼐散文选集
陈继儒散文选集

苏 辙散文选集
王安石散文选集
庄 子散文选集
○ 沈 复散文选集
戴名世散文选集
韩 愈散文选集
宋 濂散文选集
韩 非散文选集
苏 轼散文选集
刘 基散文选集
袁宏道散文选集
谭元春散文选集

ISBN 7-5306-2397-4



9 787530 623978

ISBN 7 5306-2397-4

1 · 2139 定价：18.80元

1264.9

5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沈复

【散文选集】

王宜庭 选注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81636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复散文选集 / (清)沈复著;王宜庭编. —2 版.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百花散文书系·古代散文丛书)
ISBN 7-5306-2397-4

I. 沈... II. ①沈... ②王...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328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114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2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18.80 元

沈复和他的散文

王宜庭

沈复的《浮生六记》是中国古代散文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然而它却被埋没了百年之久，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抹去了蒙在它上头的传统散文观念的尘埃之后，它的光彩才第一次豁亮地展现在世人眼前。

《浮生六记》是作者对自己逝去的如烟如梦的感伤欢乐往事的追寻，这种文字不能入于传统散文之林。散文从来被看作是政教的工具，其中的文学因素只处在形式的地位，人们并不轻视散文中的文学性，却并不承认文学性具有散文的主体品格。刘勰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魏晋本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诗赋从《诗经》、《楚辞》到魏晋风骨，其文学的自觉性

业已明确。然而在诗歌走向人的情感世界的同时，散文却唯恐不远离个人情志，而自觉地背负起发扬六经之道、维系世道人心的神圣而沉重的使命。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就是这历史性演进的标志。韩愈高扬“文以载道”的旗帜，重新明确地规定了散文的主要内容是叙治乱、陈道义、广劝戒、颂美功，散文中的文学性，只是“修其辞以明其道”而已。韩愈时代以及往后的漫长岁月，文坛有一奇特现象，同一个文人，写起诗词来浪漫潇洒，兴之所至，挥斥方遒；但作起文来，却板着面孔，恰似戴着假面，严防着个人情感的流露。散文的价值，仅仅在于明道，偏离这唯一的价值原则的作品，就要被贬到杂记之类的另册中去了。一直到清代的桐城派，这条原则也没有被动摇过。姚鼐在编《古文辞类纂》的时候，坚持这个原则是旗帜鲜明的。像《浮生六记》这类写个人身边生活琐事的作品，表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在庄严神圣的“经国之大业”的主流散文面前，自然是显得“渺小”和“微不足道”，哪里会有什么地位？沈复命笔，亦是神情所寄，无意之作，以自赏自适而已，唯独这不欲传世的率真无意之作，反倒传之后世面不朽。

光绪三年(1877)，杨引传偶得其手稿残本，为之倾倒，即以活字板排印。至此，《浮生六记》始见天日。“五四”的新文学家王伯祥、顾颉刚、俞平伯、陈寅恪、林语堂、吴宓等等均为之吸引。俞平伯于1923年2月在杭州作《重刊浮生六记序》，盛赞其文心之妙，同年10月在上海为北京霜枫社版撰《重印浮生六记序》，再次激赏其文词之洁媚和趣味之隽永，六十年后，1981年11月在北京又

为其德译本作序，真是结下了不解之缘。《浮生六记》的价值不止为国人所认识，而且得到世界的承认。林语堂曾把它译成英文，1942年纽约现代书局出版，嗣后又有谢利·M·布莱克的英译本，1960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法译本至少有两种译本：皮埃尔·里克斯曼所译的1966年布鲁塞尔拉尔西埃出版社本和雅克·雷克吕所译的1968年巴黎伽利玛出版社本。意大利文译本则由莱翁尼罗·兰西奥蒂与Tsui Tao-lu合译，1955年罗马G·卡西尼出版社出版。俄译本于1979年在莫斯科出版，译者为汉学家戈雷金娜。日译本的译者为松枝茂夫，1981年东京岩波书店出版。德文译本出自马汉茂手笔，译者由钱钟书介绍，转请俞平伯为序。俞平伯在序中说：“沈氏此《记》，余垂髫爱诵，年少时标点印行之，影响甚微。六十年后，得重印而译本遍东西洋，良非始愿所及。由隐而显，此书之幸也。”

二

《浮生六记》的作者是一位小人物，不但史传、方志不见其名，而且究竟也还算不上一个斯文举子，一生平平淡淡，没有建树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业。他是苏州人，姓沈名复，字三白，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父亲以游幕为业，他秉承父业，十五岁在浙江绍兴从赵省斋为师，十九岁习幕，二十一岁就聘。乾隆五十三年(1788)返回苏州，易业为酒商，次年贩酒亏本，仍复应幕。乾隆五十七年(1792)，因失欢于家长，被迫偕妻离家别居，曾以书

画、绣绩为生。后又赴粤经商，回苏州后还开过书画店。嘉庆五年(1800)，家庭构变，不得不再次携妻流离，三年后，即嘉庆八年(1803)，妻子客死扬州。孑然一身的沈复于嘉庆十年(1805)入石韞玉之幕。石韞玉是位显赫的文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状元，沈复因与他是垂髫之友，遂有入幕的机缘。此后沈复追随石韞玉西上荆州，次年转至樊城、潼关，又东抵济南，嘉庆十二年(1807)到北京。翌年，朝廷派使团赴琉球，除授使团正使的是翰林院编修齐鲲，此时石韞玉在翰林院供职，很可能得力于石韞玉的推荐，沈复作为随员赴琉球，同年冬即回国。此年沈复已四十六岁，《浮生六记》之前四记已完稿。此后他的遭遇以及卒年皆无可考。

沈复的文字，除《浮生六记》之外，流传下来的寥若晨星。《元和县志》记有他的七律二首：《望海》和《雨中游山》，为出使琉球所作。在当时人们看来，他的这段经历才是值得一书的。他能诗文，也能绘画，徐激《吴门画史》引彭蕴灿《耕砚斋笔记》云：“沈复，字三白，元和人。工花卉。”现尚存他的山水一帧、梅花一幅、篆文对联一副（岩前倚仗看云起；松下横琴待鹤归）。

纵观沈复的一生，按封建时代文人的价值观，值得行之为文的是跟随石韞玉、齐鲲的幕宾经历，虽为小小随员，但主人乃朝廷大员，名位显赫，应酬交往多名公显宦，所历之事多关国体，发明功德，敷显仁义，正可作不朽之大文。然而沈复却不屑为之。《浮生六记》中的《中山记历》已佚，据他的《望海》、《雨中游山》两诗和其他文字的意趣猜测，恐怕多半是偏重山水，而非外交官场记盛；即

是如此,比起前四记来,大概也要逊色得多。今已佚失,未必是件遗憾的事情。前四记中在自叙经历时,有时不能不提到幕僚生活,但总要附上一句:“此非快事,何记于此?”厌倦之意,溢于言表。沈复为文,不存任何功利的念头,只是受情感驱动,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信笔写去,尽是日常生活与凡人情态,与经世致用、明道宗经毫不相干。沈复不会不明白这类小文除自赏自适之外,别无他用,然而他却只要自赏自适——读一读《闺房记乐》和《坎坷记愁》,还可以进一步知道,这自赏自适不止是他为文的态度,而且更是他的生活态度。沈复很有文才,以他的资质,进场屋博取功名,未必没有希望,但他从没有功名利禄的想头,只是一味追求生活中的真情真爱和天然意趣。这种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使他与现实处处冲突,决定了他一生悲剧的命运,同时使他与文学达成真正的心灵默契,奠定了他的文学成就的基础。

《浮生六记》今存四记:《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后二记(《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道》)在杨引传发现手稿时就已缺佚。以桐城派眼光来看,这《浮生六记》文体不伦不类,姚鼐《古文辞类纂》将散文分为十三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赞颂、辞赋、哀祭。这十三类中,《浮生六记》文似自传,却入不了传状类。传状记叙某人生平事迹,重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业绩。大凡一篇传记文,总是以功名为纲,不外记某年进学,某年中式,某年除授某职,有何文治武功,有何封赠,集中体现封建人生价值观。沈复所津津乐道的是家庭琐事及夫妇情感生活,

完全不合传状体例。如果强要纳入桐城派文体规范,它与杂记类倒接近些。姚鼐说“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然而《浮生六记》没有称颂功德的意思,而纪事则又不求事之首尾完整,四记之每一记固然按时间顺序记叙,但四记之间没有时间顺序,也就是说,在时间上四记是平行的,一件事在此记中详写,在另一记里就略记和不记,综合各记才能得到沈复一生的编年史。况且,其文之宗旨并不在叙事,写“闺房”突出一个“乐”,写“闲情”突出一个“趣”,写“坎坷”突出一个“愁”,写“浪游”突出一个“快”,旨归都在一个“情”字。它是作者在历经人世坎坷即将走到生命尽头时对自己一生感情经历的总结,感喟多于叙述。因此把它规范在杂记类中,似乎也不完全合适。“五四”以后,有人把它划为小说,与《聊斋志异》并称,这倒是突破了桐城派的藩篱,给了它一个新的名份;然而名与实仍不相称,它不虚构,处处纪实,心到笔到,神不散而文却散,谈不上小说情节,何以能说是小说?综上所述,可见《浮生六记》在文体上独树一帜,它超越了散文的古典时代,开启了近现代文学散文的先河。

三

《浮生六记》最感人的部分是沈复和陈芸的婚恋生活,卷一《闺房记乐》、卷二《闲情记趣》、卷三《坎坷记愁》,以旖旎宛转的笔墨回叙了沈复与陈芸从青梅竹马到

结为伉俪，从新婚燕尔到流离困顿，“鸿案相庄二十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直到病榻永诀，一生的婚恋史。沈复生活在封建礼教的时代，礼教对于夫妻关系有种种戒律，这些戒律被赋予神圣的意义，形成为传统的伦理道德信条。在那个时代，只有梁鸿、孟光“举案齐眉”，乐羊子妻断机喻夫勤学等等事迹方可见诸文字，因为只有善的才是美的，唯有伦理人格才是审美对象。尽管千百年来亿万夫妻并不完全遵循礼教的清规戒律生活，但很少有人敢把夫妻不合教义的隐私公之于众，所谓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道学的虚伪性正在这里。沈复抛开道学，把自己的夫妻生活呈现在世人面前，是怎样就怎样写；“记其实情实事而已”，毫不矫情，毫不掩饰，撇开神圣的“善”而执著于一个“真”，这真有点思想解放的意味。卢梭《忏悔录》开头宣言道：“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沈复当然没有达到卢梭的理性高度，然而在精神上悟性上却是相通的。

有清一代，悼亡的作品不少，在《浮生六记》之前有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之后有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都是著名的文章，都写得哀婉动人。比较而言，它们的坦率皆不及《浮生六记》。它们写夫妻闺房生活，自然会写论书论画、斗韵品茗、吟风弄月的雅事，然而终归不出一个“礼”字。《影梅庵忆语》突出董小宛在明末清初动乱中随家流离时的卓越表现，突出她护理病中的冒辟疆的忘我精神，颇有侠义之气。而《香畹楼忆语》的王紫湘固然多情多才，但文中津津乐道的是她的贤孝，诚如陈裴之的父

亲致书陈裴之所评：“渠四年中贤孝尽职，群无间言；去冬侍汝妇之疾，尤属不辞况瘁。至其淡泊宁静，夙为汝祖所称赏，今得首从先人于九京，在渠当亦无憾。”能得到家长的如此赞赏，足见作为一个侍妾的王紫湘是如何的贤良了，陈裴之甚至引述蕙绸居士的话——“国朝以来，姬侍中一人而已”——来为她定论盖棺，其价值之取向，不言而喻而自明。冒辟疆和陈裴之都是当时大家公子、风流才子，他们写董小宛和王紫湘，都是把她们当作理想的佳人、典范的姬侍来写的，动笔之前，已有将文字传之后世的念头，先就有一个“礼”字横亘在胸臆，所以下起笔来，就不能不有所顾忌，稍涉夫妻情感隐私，一概避而远之。

沈复则不然，本人既不是名扬江南的才子，陈芸更不是封建家庭所喜欢的贤孝之妇，她是背了忤逆的恶名被家长放逐离家的。沈复写她，决没有传之于世的妄想，只因感情驱使，又不平于社会家庭的待遇，笔墨挥洒起来，实情实写，略无忌惮，就“真”而言，《影梅庵忆语》、《香畹楼忆语》之类的悼亡文字，实在是望尘莫及。夫妻闺房中论文论诗、评花品月、烹饪菜肴、栽培花木、装饰居室，种种雅事，文中一一写到。夫妻生活的这一面，是当时士大夫所津津乐道的，冒辟疆们以此为“艳福”而炫耀于人。沈复所写却有所不同，他们夫妻生活不久，即失欢于家长，多数日子是在困顿中度过的。他们闺房中作乐，是苦中作乐；他们闺房中寻趣，是穷中寻趣。甜蜜包裹着苦涩，微笑透露着忧伤，其精神境界和生活实境不可与冒辟疆们同日而语。而生活中隐秘的一面，或者说张扬出去会招致非议的一面，小的如夫妻亲昵之态，大的如非礼之

行，沈复也坦然相陈。用他在卷首自白的话说，“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

礼教对于夫妻关系有严格而具体的规定，总的原则是保证嗣统绵延和家庭稳定，根本不承认爱情的合理地位。夫妻的亲昵只能限制在卧室床第，就在卧室之内，妻子也不可以把自己的衣服挂在丈夫的衣架上，不可以把自己的物品放在丈夫的篋筒里，《礼记·曲礼》说：“男女不杂坐，不同橐枷，不同巾帔。”夫妻同房，只是为了生育子嗣，因而婚床之外，夫妻之间就应当避免肉体的接触，互相递送物品时也不可接触对方的手，“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授以篋。其无篋，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礼记·内则》）。平时夫妻相处，按《礼记·仪礼》规定：平日緦笄而相，则有君臣之严；沃盥馈食，则有父子之敬；极反而行，则有兄弟之道；规过成德，则有朋友之义。总之，夫妻之间不能有这些礼教内容之外的儿女私情。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理解沈复的父母为何不喜欢沈复和陈芸，也就会懂得沈复的文字是多么的坦诚和勇敢！

古代文人把洞房花烛与金榜题名并称，认为是人生中最大的喜事。然而汗牛充栋的历朝文集中，有那一篇写到自己洞房的真情真景呢？唯沈复敢于直笔：

……悄然入室，伴姬睡于床下，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因抚其肩曰：“姊连日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芸忙回首起立，曰：“顷正欲卧，开橱得此书，不觉阅之忘倦。《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真不愧才子之名！

但未免形容尖薄耳。”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伴姬在旁促卧，令其闭门先去。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入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样的文字，是编造不出来的，率真自然，娓娓动人；这样的文字，在小说中求之，或许可以读到，然而在散文中却是绝无仅有的。

小夫妻蜜月之后曾有三个月的别离，沈复遵父之命，往杭州从赵省斋受业，人在书馆，心却在苏州家里，分离三月恰似有十年之隔。文中写到陈芸“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半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沈复见信，“心殊怏怏”。若按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家言，这新婚乍别的情书是大有文章可作的，例如明代《清平山堂话本》之《风月相思》，赵云琼给异地的丈夫写信，一封信中就有十首情诗，缕缕缠绵，无以复加。然而那些小说家言只是文人的造境，非生活的实况，细细品味，陈芸的勉励套语，凿凿真实得多。当初分别时，沈复担心陈芸情不自禁而在人前堕泪，不意她颇能克制，不但不作儿女之态，反强颜劝勉。这种感情又比那泪水连连要深一层，她知道她的眼泪会勾起丈夫的思念不安，于是强作理性，这种体贴丈夫的爱心岂不是更深沉吗？假若不是作者亲身所历，是写不出这意在言外的文字的。

陈芸女扮男装，与丈夫同游水仙庙，在年轻夫妇看来是狂滑，是潇洒，但在礼教道德观念里，则是浪荡不成体

统。生活年代稍早于沈复的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一个超脱凡庸世俗的人物杜少卿，写他喝醉了酒，携着妻子的手，在南京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两边的游人看得目眩神摇，不敢仰视。可见这行为在世人眼中是何等出格！沈复夫妇虽不敢公开亮相，但女扮男装，究竟还是抛头露面、夫妻同游，明知“堂上闻之又不可”，仍一意行之。这行为的善恶是非如何，作者置而不顾，作者着眼的是情，是真，仍据实而写。游玩之心，并不分男女而有无，沈复怂恿陈芸女扮男装，完全出于对陈芸的爱，使她开心而已。虽然，这举动和其他许多有失“斟酌”的举动累积起来，便成为悖离礼教的罪名，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但是作者心怀坦荡，形之为文，即表示自己终不愧悔。

万年桥舟中沈复夫妻与船家女素云行酒讴歌，则更是“荒唐”的举动。陈芸与丈夫偕游太湖，已是瞞着家长，而泊舟万年桥下，与船家女行酒嬉戏，已近狹邪之行，无怪乎朋友以为沈复“挾两妓饮于万年桥舟中”。其描写之细，亦近于小说家言。再说陈芸见责于家长的“结盟媚妓”之事，文中也作了详尽叙述。陈芸为丈夫物色美妾，令人颇难理解，时代已根本变革，一夫多妻制以及相应的道德意识已成为历史，但在那个时代，这是件平常的事情。当然不妒之妻并不多见，所以陈芸此举颇有“贤惠”之风。《红楼梦》中邢夫人曾为丈夫贾赦做媒，要纳鸳鸯为妾，贾母斥责她说：“我听见你替你老爷说媒来了，你倒也三从四德的。只是这贤惠也太过了！”陈芸的封建意识且不论，就其动机而言，她与邢夫人绝然不同，邢夫人“只知承顺贾赦以自保”（凤姐语），所以贾母挖苦她“贤惠也太

过了”；陈芸没有私心，她认为男子既然天经地义可以纳妾，她就要为她心爱的丈夫选择“美而韵者”。她以为情可动天地，不知钱能通神，她真心与妓女憨园结为姊妹，结局却是憨园别嫁富人。陈芸对于家长所加的“结盟娼妓”的罪名并不在意，她懊恼和愤懑的是感情被欺骗，她不平的是这个世界太势利，太俗气。沈复毫不顾忌“结盟娼妓”的丑名，将这件事情的始末叙述出来，正是执著于陈芸的天真和热情。

奥瑟罗说：“请你们在公文上老老实实照我本来的样子叙述，不要徇情回护，也不要恶意构陷。”这句台词可以理解是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宣言，也可以引用来说明沈复的创作思想。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开章明义，声言自己的作品“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在真实这一点上，他很自信，料想经得起推敲，所以他希望读者着眼于此，而不要计较他的文法。古今中外无数文学现象都反复证明着一条真理：有真实的地方才有诗，虚伪永远与艺术绝缘。《浮生六记》的艺术生命力，也就是在“真诚”二字。

四

真诚需要勇气和自信。在弥漫着道学的庸俗和虚伪的社会里，沈复坦然地向人们敞开自己的胸怀，无异于向庸俗而虚伪的道学挑战。沈复不是思想家，但他是一个“多情重诺，爽直不羁”、热爱生活的人，他和他的爱妻陈芸都是“情痴”，他们没有做错什么，然而他们一再受到打击，弄得家破人亡，他始终不明白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不得

其解而百思之，在陈芸去世之后的无数寒窗孤灯下，他都在思索着，反问自己。他与陈芸情笃意深而中道永别，难道是“恩爱夫妻不到头”？陈芸多情聪慧而处处遭致非议责难，难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果真是千古至言？那如梦如烟的往事，在沈复的灵魂里都一一地细细地而且反复地咀嚼过，他怎样想也不能接受通常的解释，他不平，他忧愤，他坚信他们夫妻之情无可指责，于是把这萦绕情怀的往事吐露出来，向渺渺苍天讨回一个公道。他虽然不是思想家，但他却在直感中抓住了那个时代的一个重大问题：个性与礼教的冲突。

沈复对自己的认识未必十分清楚，他说他多情重诺，爽直不羁，自然不错，然而从他的叙述里不难发现，在他和陈芸的性格里潜藏着叛逆礼教的精神，即对个性和自然的崇尚。儒家主张克己复礼，以礼节情，实质上是要以礼教规范来压抑个性，扼杀个性，否定人的价值，否定人的自由和解放，从而使个体失去其主体性。在这种传统观念之下，每个人是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追求，即自我意识的。谁违背了这一点，谁就会遭到社会的严重的挾伐。

在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里，在沈复这个以游幕为业的家庭里，按家庭和社会的意志，沈复应当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至少，也该继承父业。但他对于科举似乎连念头也没有动过。做幕僚，他的确学习过，实践过，可是他深深讨厌这种生活，“轮蹄征逐，处处随人”，官场上“卑鄙之状，不堪入目”，他情愿易儒为贾，去做人们瞧不起的商人。沈复崇尚自然，就看不惯官场上的矫情；维护个人的尊严，就不可能去趋奉官僚的卑劣；寻求真实，就不能与